

铁路 币制改革 天津官银号 废除科举制度 郑孝胥

实业教育 地方自治的样板 1905年的大辩论 丙午改制

岑春煊 司法改革 离心与反叛 黄兴 通讯事业的兴起

驱除鞑虏 新老交替的断层 中兴重臣 端方 武昌新军

起义 《乐游漫笔》 内阁总理大臣 南北谈判 孙家鼐

排满主义 从地方走向中央 千载难逢 逼迫清帝逊位 遇

祸民初 段芝贵 拥兵自重 新政 庚子事变 刘坤一 山

东巡抚 戊戌变法 徐世昌 荣禄告密 资产阶级改良 全盘

西化 唐绍仪 阮忠枢 水师学堂 北洋武备学堂 狱政改

良 义和团运动 李鸿章 千古变局 光绪 醇亲王奕

司马氏之心 辛亥革命 直隶总督 民族资本主义 吴长庆

整顿中国条陈》 北洋大臣 天津小站 张之洞 段祺

瑞 北洋三杰 封疆大吏 施肇基 严复 现代文明的

广泛渗透 杨度 整顿中国条陈》 陈其南 廖仲恺 古建北洋六镇 测

绘学堂 孙中山 陈其南 廖仲恺 古建北洋六镇 测

瑞 北洋三杰 封疆大吏 施肇基 严复 现代文明的

广泛渗透 杨度 整顿中国条陈》 陈其南 廖仲恺 古建北洋六镇 测

军 皇族 陈其南 廖仲恺 古建北洋六镇 测

办警察 陈其南 廖仲恺 古建北洋六镇 测

天津官银号 陈其南 廖仲恺 古建北洋六镇 测

变革中的危机

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

□ 楚双志 著

五大臣出国 劝业铁工厂 徐世光 吴煜 达斌
军 私人集团 出洋游历 载沣摄政 杨士骧 修明操法

陆军警察学堂 上奏清廷 北洋军的骨干热河 将帅之材

张镇芳 长袖善舞 兼收并蓄 毛庆蕃 周学熙 梁士诒
才长心细 巡警总办 刺杀宋教仁 林文彬 蓝建枢 改良

直隶税法 何宗莲 张怀芝 曹锟 赵国贤 姜桂题 军事

学堂 王廷桢 遣派教员 宣统元年 速成武备学堂 保

定军官学堂 新军阀形成 八国联军的入侵 练兵之道 改

弦更张 赵尔巽 两江总督周馥 升允 提倡实业教育

世续 载振 留学生金邦平 高淑琦 张英绪 直隶师范

学堂小学堂暂行章程 朝臣之首 追念戊戌往事 陶湘

本初另有深意 张伯岑 聘请外籍教师 以顺民命 第一枚

棋子 曹汝霖 黄仕福 麟集东北 章宗祥 陶大钧 张

作霖 徐世昌督东 左设治 土匪的收编 孟恩远 设行省

公署 抚掌一切机要 预备立宪 慷淡经营 震晴发聋

《公决草案》寿善 葛宝华 御史张世培 历史潮流引
戴鸿慈 陆润庠 候旨遵行 一针见血

张百熙 文章弹劾 庸臣当指奕 上意大开

吉灿升 何国 水师力量 孙多森 水师

变革中的危机

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

上架建议：社科与历史

ISBN 978-7-80195-889-1



9 787801 958891 >

定价：2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革中的危机：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 楚双志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80195-889-1

I . 变… II . 楚… III . ①袁世凯 (1859 ~ 1916) —生平
事迹②中国—近代史—清后期 IV . K252 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68624号

变革中的危机——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

作 者 楚双志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70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5-889-1/K · 148

定 价 28.00元

变革中的危机

——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

楚双志 著



九 州 出 版 社
JIUZHOU PPRESS

前 言

20世纪初的10年（1901—1911年），是清末新政的10年，也是清王朝的最后10年。在这10年中，希望与幻灭并存，出路与绝望并存。清廷指望通过这次改革与调整，一方面重振民心，渡过所存在的严重的统治危机；一方面为国家寻找出一条出路，使国家达到富裕强大的境地。但由于清廷没有能力来领导这样一场“前不见古人”的改革运动，加上当时整个国家行政官僚机构的极端腐败与混乱无序，结果，这场自上而下的几乎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近代化运动失败了。

清末新政是以清朝统治集团为政治主体进行的一次政治改革，是中国早期近代化过程中一项重要内容，它给予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以深刻的影响。在这一促进中国近代社会各方面迅速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过程中，袁世凯集团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与加速作用。以袁世凯为首的袁世凯集团，为了领导当时的潮流，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清末新政中，对于各项新政措施，不遗余力，积极推行，成效显著。在清末新政中，军事、警政、教育、宪政、实业等方面的巨大变革都与袁世凯集团的努力密不可分。袁世凯集团举办的新政以直隶、东三省等地区为主。尤其是直隶新政，影响更为巨大，可以说是在各方面开风气之先。袁世凯集团助推新政的成功，使袁世凯一时如日中天，为天下所瞩目。这为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集团乘机倾覆清室，实现从地方走向中央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行改革，寻找出路，对于清廷来说，本来是一件再正确不过的事情，但改革造就了袁世凯集团这一异己势力，则是清廷推行新政时始料未及

的。变政不但没能挽救自身，反而加速了自己灭亡的步伐。新政改革中已潜伏着清王朝灭亡的巨大危机。

本书选择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主要原因有三：

(一) 新政使袁世凯集团如日中天，这是清廷与袁世凯集团权力此消彼长的一个关键。

袁世凯集团是指在清末承传湘、淮集团发展而来，利用清廷拙于应付内外危机的时机，在甲午战争后逐渐形成并在新政这一合法条件下迅速膨胀起来的一个以袁世凯为首的军事官僚团体。

清末新政前夕，袁世凯集团已经由小站练兵时期、戊戌变法时期、山东执政时期这三个发展阶段，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官僚二者相结合的团体。不仅是继李鸿章淮系势力衰败之后重新崛起一个新的军事政治集团，而且成为清廷愈来愈依之为柱石的地方实力派集团。

到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集团将军事、经济、教育、洋务、巡警等事业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这一集团在清末新政中发展之快、力量之大、取得的成就之巨，是同一时间内的其他地方实力派集团瞠乎其后、望尘莫及的。它的出现与膨胀，破坏了清王朝政治结构的正常运作，蛀蚀了清王朝的统治之柱，加剧了中央权威资源的流失，打破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均衡，使清政权迅速进入了最后阶段，即灭亡阶段。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清末新政有着很大的关系，以之为视角来研究清末政治史，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视点。

(二) 清末新政是袁世凯集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写下的非常精彩的一笔，值得研究。

袁世凯集团虽然在新政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由于这一集团在民国初年对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消极性，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之重视不够。直到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这一问题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开始在各个领域谈及。但是，对于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的关系的直接研究、探讨还很不全面、系统与深入，还留有很大的研究余地，无论是资料的发掘或是研究的深入，都可以在吸收他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有

所开拓和前进。

（三）袁世凯集团在新政期间的活动是清末新政的一个缩影。

在清末新政中，成就、影响最大的主要集中在直隶、湖北、东三省三个地区。除了湖北地区的新政由张之洞集团负责推行外，直隶、东三省的新政则全部由袁世凯集团来负责推行。因此，袁世凯集团所推行的新政构成了清末新政的主要组成部分。探讨、研究清楚袁世凯集团和清末新政的关系，实际上就可以窥斑见豹，达到洞察清末新政的本质、总结其成功与失败原因的目的。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东西，往往对现实有着至关重要的鉴示。

本书宗旨不是专门研究袁世凯集团的发展历史，也不是专题考察整个清末新政的基本情况。本书所侧重的是社会角色与社会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把袁世凯集团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将其置于清末新政之中，既探讨其对清末近代化的作用，又力图说明其对清末政局及清廷权力变动的影响，力图揭示清末中央和地方权力此消彼长的变化根源及其来龙去脉。

全书共分五章，主要解决如下问题：

第一章是对新政前夕袁世凯集团创生的机缘及其发展的基本线索的阐释，重在揭示袁世凯集团响应清廷上谕的过程和原因，并且总结袁世凯集团关于新政的观点和主张，这是了解袁世凯集团在清末新政中所作所为的关键。

第二章是对新政期间袁世凯集团在直隶主要作为的总结。本章从袁世凯对人才延揽，对吏治的整顿，从军事、警政、经济、教育等方面变革来分论袁世凯集团在直隶新政中的表现和作用。军事方面，重在从练新军与办军校两个方面来探讨袁世凯集团在新政时期的军事扩张情况。警政方面，袁世凯集团在直隶和京师的巡警建设方面都有所建树。经济方面，论述了新政时期袁世凯集团在直隶省的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领域的主要活动情况。教育方面，袁世凯集团在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和留学、造就新式人才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章专门论述袁世凯集团与清末东三省新政的关系，揭示袁世凯集团在清末东三省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章从预备立宪的角度集中探讨袁世凯集团在清末政治近代化进程中的表现与作用。

第五章从动态角度来研究和探讨清廷、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力图说明清末新政对清廷与袁世凯集团权力消长的影响，从而揭示清末最后10年政局动荡的根源及清王朝覆亡的原因以及民国初年政局走向的历史必然性。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袁世凯集团扩张的契机	1
一、袁世凯集团的兴起	1
二、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23
三、新政实践的时空轮廓	27
第二章 直隶新政	39
一、袁世凯的用人路数	39
二、祛锢弊而订新章	55
三、北洋六镇与军事学校	63
四、创建近代化的巡警制度	81
五、兴办北洋实业	92
六、大力发展新式教育	118

第三章 又一幅新政肖像	129
一、北洋势力向东三省的渗透	129
二、政治的刷新	132
三、发展东三省经济	137
四、兴教育开民智	142
五、加强军事防务	145
第四章 立宪：变政与权争	149
一、地方自治的样板	149
二、1905年的大辩争	155
三、丁未政潮	163
四、司法改革的领头羊	171
五、狱政的改良	175
第五章 换位：权威和秩序的重建	179
一、天下瞩目的强势集团	180
二、清廷的危机	192
三、从地方走向中央	199
四、遗祸民初	206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208

第一章 袁世凯集团扩张的契机

一、袁世凯集团的兴起

袁世凯集团的兴起是清末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

吴虬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文中说：袁世凯集团“惟自创生以迄溃败，亘延二十余年，决非偶然事实……但物竞天择，惟适者存，北洋派之兴，必有适于生存之环境，北洋派之败，必有不适于生存之环境”。^[1]此言一语中的。

从光绪二十一至二十七年（1895—1901年），短短7年间，袁世凯集团何以能强有力地崛起，并迅速成为清廷赖为存在的柱石？其原因纷繁复杂，但可以肯定的就是它的崛起绝不是偶然的。大致说来，决定这一集团产生与发展的原因有六：（1）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太平天国的打击，导致清王朝的经制之师——八旗兵和绿营兵的没落。（2）在安内攘外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和汉人地方集团迅速崛起，改变了大清王朝200余年的基本政治结构，中央与地方的平衡被打破，军事政治权力下移到地方，“千古变局”出现，王权危机陡增。（3）在甲午战争中，淮军瓦解，中国需要一支新的武装力量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4）甲午战争后，淮军失势，李鸿章病逝，淮系军事政治集团支撑清王朝大厦的时

[1]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六），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代结束。清朝政治出现了一个相对的真空，需要新的政治势力来填充。（5）清末官场腐败，掌权人物腐化，给袁世凯集团发展私人势力提供了契机。（6）在淮系崩溃以后，以袁世凯为领袖的袁世凯集团崛起，而不是以其他什么人为领袖的什么集团崛起，是与袁世凯自身的才干和作用密不可分的。读袁世凯的奏疏、信札和有关袁世凯的传记，给人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即袁世凯的抱负和雄心很大。对袁世凯十分了解的荣禄就曾指出：“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然异日终当出头地。”^[1]正因为袁世凯有这样的抱负和雄心，他才能在以后的新政中，率领袁世凯集团在山东、直隶与东三省做出很大的成绩，从而为袁世凯集团迅速从地方走向中央、利用辛亥革命之机走向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创生的机缘

袁世凯集团在新政前夕的迅速崛起，是鸦片战争以来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变化、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各种矛盾积累发展的必然结果。主要表现在：

1. 袁世凯集团是承传湘、淮集团自然发展而来的。著名学者罗尔纲先生说：“近世北洋军阀的起源，追溯起来，实始自湘军兵为将有的制度。”^[2]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镇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清廷下令各地在籍大臣，连省督办团防。曾国藩采用新的方法，在湘将分散的地方团练习合并，形成了独立的正规武装——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这支军队发展壮大成为一个震慑朝野的湘军集团。在湘军集团内，曾国藩利用同乡、门生、故吏等地缘、血缘、师生的封建关系来形成军队的主干，并由这些主干自行在家招募士兵，这样便形成了从士兵到将领直至曾国藩为中心的层层隶属网络。军队所信仰、效忠的，便不仅是国家，更直接的是曾国藩个人了。湘军的这个特点，奠定了它在近代中国半私人军队先驱的地位。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进程中，湘军很快就取代了绿营兵而成为主

[1] 郭则沄：《南屋述闻》，章伯锋等：《落日残照紫禁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

[2] 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力。曾国藩湘军领袖的地位，随着湘军集团的发展也不断上升，成为威慑一方的封疆大吏。他们在军事方面，用兵为将有代替了兵归国有、募兵制度代替了世兵制度；在政治方面，用督、抚专权代替了清室专权。湘军兴起以后，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开始掌握地方实权，从此打破了满洲贵族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治以后，湘军将领中有 13 人做了总督，13 人做了巡抚，如江忠源、李续宾、严树森、刘长佑等都官至督抚，而李鸿章、左宗棠更是权倾朝野。“内轻外重”的局面遂告形成。正如范文澜所说：“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挽救了满清，同时客观上也削弱了满清，满汉统治者之间，势力起着显著的变化，从此满清政权，逐渐向汉族军阀转移。”^[1]

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为了减轻朝廷的疑忌心理，曾国藩大量裁撤湘军，湘系的军事地位下降，淮军则上升为清王朝所依靠的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淮系集团乘势而起。

淮军是继湘军以后，汉族地主建立的另一支地方武装。淮军集团实际上是从湘军集团中分离出来的。它的领袖李鸿章本来就是曾国藩的重要幕僚。咸丰十年（1860 年）四月，太平天国攻破江南大营，长江下游尽为太平军所有。为了防止上海陷入太平军之手，咸丰皇帝命令曾国藩率领湘军开赴长江下游。但是曾国藩不愿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长江中上游地盘，为了执行朝廷的命令，他于同治元年（1862 年）初命其亲信李鸿章回家乡合肥招募淮勇五营。同时曾国藩又拨湘军数营给李鸿章，并派湘军名将程学启、郭松林帮助李鸿章按湘军营制训练淮勇。在朝廷方面，曾国藩又竭力举荐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担任江苏战场上镇压太平军的主帅。自此，李鸿章的淮军迅速发展，在镇压太平军、捻军过程中发展成一个势力强大的军事集团。同治十年（1871 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倾一时，在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渗透经营 20 余年，门生故吏遍及各地，造成了一个舍他之外，清廷无其他兵力可倚、无其他能员担任外交的局面。时人奏参李鸿章兄弟一门：“以功名显，其亲党交游，能自树立。文员自监司以上，武职自提镇以下，实

[1]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432 页。

不乏人……惟勋伐既高，依附者众。当时随从立功，身致富贵者，又各有其亲友。展转依附，实繁有徒。久之倚势妄为，官司碍难处置。”^[1]就是这样一个清廷赖为依靠的地方实力派集团，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战争中却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中央集权制度及其现存法规，既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地方分权所破坏和取代，这就必然埋伏下了日后中央与地方、满与汉新一轮权力斗争的祸根。继淮系而起的袁世凯集团，正是承传了湘、淮集团这样的基因，并最终形成了后来夺取中央政权的最大政治资源。

湘、淮集团开创的局面为袁世凯集团所享有，这是袁世凯集团得以顺利发展、急剧膨胀的重要条件。近代著名军事家蒋方震说过：“湘军自咸丰二年办团练始，迄光绪六年左宗棠大定回疆，为时盖三十年。自是以还，湘军之事业无闻焉。淮军自同治四年曾国藩陈湘军暮气不可用，荐李鸿章自代，遂以李节制各军，迄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之败，为时亦三十年，自是以还，淮军之事业无闻焉。小站练兵始于光绪二十一年，五年而小成，十年而大成，今功名之盛，较湘淮军有过之无不及也。明乎递嬗之迹，以其时考之则可矣。”^[2]曾国藩集团——李鸿章集团——袁世凯集团构成了晚清历史上导致中央政权结构不断削弱并最终被打破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链条。正是这个链条，最终束缚并绞杀了清王朝。

2. 袁世凯集团是甲午战争后清廷企图加强中央集权，从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手中收回军事权力的产物。在甲午战争中，“湘淮同悲”，清廷致力30余年的自强运动在丧师失地、割地赔款中宣告破产。淮军在甲午战争中覆灭，淮系失去了自己的军事后盾，从此为清廷所冷落。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军队，甲午中日战争中军事上的失败，刺激着社会重文轻武的风气发生改变，到处发出整军经武的呼声。清廷失去了淮军的支撑，也极力想早日建成一支属于自己的新的武装力量。在此背景之下，袁世凯、张之洞等洋务派开始注意以西方军队的训练方法、管理方法来改造

[1] 《奉旨查办事件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十八，第11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9117～9118页。

[2] 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来新夏：《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1页。

现有的军队，这就开始了清末新式陆军的编练。于是，北洋军崛起，袁世凯集团遂继淮军集团之后迅速崛起。

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淮军溃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而告终。这个事件，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也给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新调整创造了新的机会。甲午战争后期，清廷成立了以荣禄为中心的“督办军务处”，试图编练中央控制下的新军以取代地方的勇营，重建中央集权的军事支柱，这是从地方实力派手中夺回从太平天国时期就流失到地方督抚手中的军事大权的一种努力和尝试。“这次要旨，是想培植一个像汉人军阀一样的能控制整个大局的满洲亲贵。结果承继李鸿章军阀的，不是满洲亲贵而是袁世凯。”^[1]清朝中央政府这场旨在从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手中收回兵柄的措施，“正是袁世凯绝大幸运的照临，也就是北洋军阀基础确定的第一步”^[2]。

由于荣禄深受慈禧太后的赏识，且对军事素具雄心，“欲借机培养自己实力”，袁世凯便趋承意旨，代为谋划。因之“世凯之得在小站练兵，完全由于荣禄所提挈”。^[3]小站练兵使袁世凯获得了发展私人势力的机遇。袁世凯一到小站，立即网罗私党，抓紧建立自己的骨干班底，袁世凯集团由此产生。

让袁世凯练兵，并不等于把新军的领导权交给他。在派袁世凯督练新军的同时，又委派满人荫昌挑选八旗精壮子弟附入天津武备学堂，“预储他日将才之用”。清廷此举，意味深长。编练新军，本来就是想扶植一个能像李鸿章那样的能够控制整个大局的满族亲贵，但是遍观当时朝野，能担此重任者无人。因此，清廷一面让袁世凯练兵，一面让满人少壮亲贵荫昌选将，“实与袁世凯督练陆军互相表里，且同在天津，相距

[1] 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2]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页。

[3] 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不过数十里”^[1]，既可起到监视袁的效果，又可随时将新建陆军抓到自己的手中。清廷这番心事可谓巧妙之至了。但是，一方面由于袁世凯对荣禄曾极下工夫，博得了荣禄的赏识和信任；另一方面，荣禄为人工心计、善权谋，他认识到要想培养出满洲贵族自己的新的军事力量，加强中央集权，只有先笼络、利用像袁世凯这样有才能无根基的汉族官僚才有可能，加之他在奉旨查办袁世凯问题赴小站后，亲见新建陆军军容严整，装备精良，早存俟新军练成揽为已有之心，因而极力保袁。袁世凯在荣禄的庇护下，不仅能在天津小站顺利地建立自己的最初集团班底，而且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被擢升为直隶按察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由于投机维新运动而得到一个候补侍郎的头衔。在多次风潮中，袁世凯都是借了荣禄之力，才避过了朝中亲贵的冲击，因而，袁世凯就更加依附荣禄。戊戌政变后，袁世凯立即向荣禄献策，以京津地区五大军合编为武卫全军：“以宋庆为武卫左军，以袁世凯为武卫右军，以聂士成为武卫前军，以董福祥为武卫后军，其中军则荣相自领之，兼总统武卫全军。”^[2]袁主动将新建陆军并入武卫军，既可摆脱孤立无援的局面以避风险，又可得到荣禄的翼护，巩固自己的地位，尤可以满足清廷“集权中央”，“将主帅统辖的权力付与满人”^[3]的做法。而荣禄也“乐其推戴，且可弋取统属文武之名也，德项城甚，有相逢恨晚之感”^[4]，不久又保袁升为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仍令之专统率武卫右军，所部增至1万人。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山东爆发了反对洋教为主旨的义和团运动。由于山东巡抚毓贤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个事件，结果，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境内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势。面对山东的局势，袁世凯多次向荣禄陈述自己的看法和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荣禄认为袁不仅是自己的人，而且有魄力，是一个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因此就竭力保荐袁去山东任职。

[1]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二，来新夏：《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2] 《小站练兵缘起》，《凌霄一士随笔》（三），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2页。

[3] 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4] 《小站练兵缘起》，《凌霄一士随笔》（三），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2页。

这样，十一月初四（12月6日），清廷发布了派袁世凯接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的上谕。袁世凯抚东，是袁世凯集团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袁世凯集团开始由一个单纯的军事团体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地方性的军事政治集团。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1901年1月29日），清廷在西安行在宣布实施新政，从此掀开了清末新政的帷幕。但是，清廷自仓皇西逃回銮后，对于庚子事变中东南督抚的行为，心中自然不无芥蒂。当时，东南督抚们联合一气竟然不执行朝廷命令，对中央的呼救置之不理却与列强各国达成默契，宣布东南互保，使东南地方保持既不倾向政府又不倾向列强的中立，隐与中央相抗衡。特别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后地方督抚对朝局影响力加强，就更使朝廷寝食不安。因此，剥夺地方督抚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就成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后的急务，也成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后新政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六月初二（7月17日），清廷谕令：“江南自强一军，著刘坤一饬调前往山东，交袁世凯酌量分布，督饬训练，务成劲旅。”^[1]清廷此举，用意深远。甲午战争后，清廷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武卫军，在与八国联军的战斗中损失殆尽，只有袁世凯训练的武卫右军与张之洞建立的江南自强军因没有参战而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因此，夺取并扩充这两支新式军队就成为清廷在新政期间收回兵权的第一着棋。但是，老于世故的慈禧太后，知道外重内轻之势已成，并不直接去剥夺张之洞、刘坤一等东南督抚的兵权，而是不着痕迹地将自强一军调归山东巡抚袁世凯，美其名曰：“江南自强一军，素练洋操，本系备调之队，现在山东武卫右军调派三千人赴京弹压地方，该省未免空虚。”^[2]因为此任务如此重要，才要调派这支军队。这样做不仅脱去了清廷急于剥夺东南督抚兵权的嫌疑，而且，不久调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后，这两支当时中国最强的军队就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护卫清廷的任务，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主要军事支柱。

[1] 《请收回督练自强军成命折》，《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页。

[2] 来新夏：《北洋军阀》（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9页。